



中国哲学史丛书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

何威 著

中国哲学史丛书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

何成轩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

何成轩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5印张 5插页 17.2万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100

ISBN 7—216—00005—6/B·3

统一书号：2106·103 定价：2.35元

出版说明

《中国哲学史丛书》是发表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一套书，每本十万字左右。它包括哲学史上专人研究、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思潮研究以及哲学古籍校勘和注释等。

丛书的编辑工作，由丛书编辑委员会领导。其成员为：张岱年、石峻、任继愈、冯契、辛冠洁、邱汉生、王明、艾力农、肖箴父、曾乐山、袁尔巨、陈俊民、贾顺先、吕希晨、陈克明。

丛书编辑委员会召集人为辛冠洁。

丛书的主编为陈克明。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事迹与政治思想	1
第一节 参与维新	1
第二节 鼓吹革命	10
第三节 辛亥前后	31
第四节 渐入颓唐	39
第二章 哲学思想发展的两大阶段	46
第三章 前期哲学思想	63
第一节 以“阿屯”为世界本原的自然观	63
第二节 形神关系与无神论思想	76
第三节 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的反映论	88
第四节 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观	101
第四章 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125
第一节 哲学体系的建立及其特点	125
第二节 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136
第三节 本体论	148
第四节 对“二边执三倒见”的批判	174
第五节 以“原型观念”为基础的时空观、规律论 与因果论	182
第六节 先验论与经验论	200
第七节 相对主义真理观	217
第八节 俱分进化论与五无论	234
第九节 无神论与无神教	252
第五章 向唯心主义转变的原因	277

第一章 生平事迹与政治思想

第一节 参与维新

章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号太炎。初名学乘，因仰慕顾炎武的为人，又改名绛（顾炎武名绛）。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出生在浙江余杭县的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江苏苏州。

章炳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生经历了剧烈动荡的时代。在他出生前的二十九年，即一八四〇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一步一步地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从此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广大人民。中国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前仆后继，进行了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奋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在章炳麟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先后

爆发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等。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象大海波涛一样冲击着章炳麟的头脑。他目击了社会的变迁，并被卷进时代的潮流，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

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十分复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政治局势经常处于大动荡、大分化之中。章炳麟走过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他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思想极为驳杂，而且发生过许多变化。可以说，他的思想，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章炳麟从九岁开始到十三岁为止，在自己家中跟随外祖父朱有虔（海盐人）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其文化启蒙和思想熏陶。外祖父不仅使他稍知经训，而且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开始播下了仇满、反满、逐满的民族主义种子。朱有虔在讲解四书五经之余，常给章炳麟讲述明末清初的历史故事和王夫之、顾炎武的著作，向他灌输“夷夏之辨，严于君臣”的《春秋》大义。章炳麟对清朝灭明十分痛心，曾经很愤慨地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①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出自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之口，在当时确是不简单的，这说明了章炳麟从小就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二十五期。

很关心民族胜衰国家兴亡。

一八八〇年，章炳麟的外祖父回海盐老家以后，他跟随父亲章濬继续念书。这几年，他一直家里诵读六籍，涉猎史传，浏览《老》、《庄》。十六岁那年，父亲命他赴县应童子试，他因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当时有病，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少甚异族”（《自述学术次第》）。不屑参加清朝的考试。他除了完成父亲督教的功课以外，又常偷阅蒋良骐的《东华录》以及《明季稗史》等书籍，了解明朝亡国和清军入关的历史情况。当他看到清军大规模屠杀扬州、嘉定人民和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案件的有关记载时，便禁不住怒火中烧。后来，他曾经多次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感受：“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狱中答新闻报》）。“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演说录》）。清朝政府对汉族人民的残暴镇压，尤其是他们制造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激起了章炳麟的无比愤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从这里孕育、发展起来的。他广览史书，冥志覃思，政治学术以荀子、司马迁、刘向为权度，并推崇盖宽饶、诸葛亮、羊祜、黄宗羲的为人。

一八九〇年，章炳麟的父亲章濬病逝。他料理完丧

事以后，便离家赴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的持有人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他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朴学大师，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诸书，对弟子要求也十分严格。章炳麟在诂经精舍生活了七年，除了向俞樾问学之外，还向高学治请教经学，向谭献请教文辞法度，并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学术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俞樾。他在俞樾的教导下潜心典籍，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继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以小学（文字学）为门径，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写成《膏兰室札记》稿本四册，考释儒家经籍和周秦诸子，时有新意。这时，他是一个埋头书斋，接受封建文化教育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正当章炳麟孜孜不倦地钻进故纸堆里探讨学问的时候，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乎已被列强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它们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遭到惨败，翌年，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次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掀起了侵略中国的

狂潮，中国陷入了“豆剖瓜分”的严重局面。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开后，朝野震动，群情激愤。五月二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鼓动各省应试者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随后，又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等政治团体，出版《中外纪闻》、《强学报》（1896年1月创刊）等刊物，推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声浪遍及全国，给章炳麟以很大的震动。一八九五年，上海强学会征求会友，他立即寄去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一八九六年八月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章炳麟接受汪、梁的邀请，于一八九七年一月离开诂经精舍，前往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尽管俞樾不高兴他这样做，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宁静的书斋，投身到沸腾的社会斗争中去。

章炳麟任职《时务报》期间，发表过《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前一篇文章里，他大声疾呼“发愤图自强”，“修内政”，“新制度”，反对“惟旧章之守”的政策，而在外交上则提出“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的策

略。在后一篇文章里，他主张“以教卫民，以民卫国”，广立学会以通民气，并且强调指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这时，章炳麟在政治上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主张，在学术上也曾引用过康有为今文经说的某些观点。

但是，章炳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间仍存在重大分歧。首先，章炳麟并不满足于温和的改良；从少年时代就孕育的排满之念，不时在他心中激荡。他在时务报馆看到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使馆逮捕的消息，询问梁启超，知道孙中山主张排满革命，就很赞赏钦佩，“窃幸吾道不孤”^①。其次，章炳麟信奉古文经学，康、梁则信奉今文经学，双方学术观点也如同冰炭，始终无法调和。加上康有为倡言孔教，神化孔子，康门弟子更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章炳麟对此深表不满，忍不住“大声疾呼，直攻其妄”（《致谭献书》）。后来，章炳麟回忆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他

① 《致陶、柳二子书》，1903年5月。参见章炳麟1933年10月10日所作的演讲《民国光复》，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

与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经常争吵，甚至发展到动武的地步。他在《时务报》勉强工作了几个月，就愤而离开，返回杭州，编辑《经世报》，并为《实学报》、《译书公会报》写稿。

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使章炳麟忧心如焚，他呼喊：“大波将激，大火将燼，而无忧怖者，其人情乎哉！”“故议变法者，吾党之责也。”“变法者，非口说也，必躬自行之；躬自行之而不可济，必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变法箴言》）。只有舍生忘死实行变法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认为，要变法就必须设学会，办学报，抛弃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思想态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他担任译书公会报主笔，表示“欲抽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译书公会叙》）。通过介绍西方各国情况来启迪民众，推进变法。他又主张通过提高消费来刺激生产，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他明确反对设立议院，反对民主和平等。他认为变法应由清朝皇帝领导，设立议院和实行民主条件均未具备。他在《变法箴言》中曾指出：如果设议院、立民主，势必引起争论不休，甚至酿成天下大乱，“域内抢攘，流血漂卤”。他又认为君臣权力不能平等，只有人们对君臣的褒贬可以平等；同样，父子、夫妇之间，也是不能平等的。“故曰：平等之说，非拨乱之要也”（《爓书·平等难》，见《爓书》木刻本。以下凡引自《爓书》而不加注者，均据木刻本）这些反映他当时思想的落后面。

一八九八年春，章炳麟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来到武昌，筹办《正学报》。张之洞是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趋附维新，列名强学会，标榜实行新政，用来捞取政治资本。但他不喜欢今文经学，所以延揽专治古文经学的章炳麟入报馆，借以抬高自己的声誉，打击康、梁借今文议政的理论。当时他正在撰写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征询章炳麟的意见。章炳麟看到该文侈谈三纲五常、效忠清室，非常反感，认为清朝统治者蹂躏汉族近三百年，不应该对他们忠爱，要谈忠爱，必须等到革命以后。张之洞及其幕僚听了这些议论又惧又怒，于是把章炳麟撵走。

章炳麟回到上海不久，汪康年聘请他担任《昌言报》笔政。当年九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名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十二月，章炳麟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追捕，应日本友人之召，东渡我国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次年六月，离开台湾到日本。在横滨梁启超寓所晤见孙中山，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八月，章炳麟回到上海，旋即返回浙江。冬天，又由浙江来到上海，参加由唐才常主编的《亚东时报》编务。

一八九九年初章炳麟避居台湾时，把自己过去发表的和新撰的政治学术论著辑订为《燹书》，并于当年冬天

付梓，次年上半年出书，是为初刻本（木刻本）。《燹书》是章炳麟早期的一本重要著作，集中地反映了章炳麟当时的思想观点。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章炳麟对改良主义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在亡命台湾和日本期间，怀抱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更多地了解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从《燹书》的删订，可以看出他思想发展变化的迹象。原先发表的鼓吹变法的一些论文，例如《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变法箴言》等等，受康有为改良主义的影响较深，主张“以革政挽革命”，强调变法要有次序，应循序渐进，有时甚至采用某些“托古改制”的说法。这些论文，章炳麟没有收入《燹书》初刻本。但他当时还和“尊清者游”，政治上没有和康、梁改良派划清界线，《燹书》原刊本的主要倾向，仍然是改良主义的。他虽然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某些罪恶，但仅仅主张把封建专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推翻它。他把清朝皇帝称为“客帝”，希望其“发愤为天下雄”（《燹书·客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法自强，挽救危亡。他虽然愤怒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又缺少反帝的勇气。

第二节 鼓吹革命

一九〇〇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帝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组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带光绪皇帝逃窜西安。次年九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这些事件，既表现了中国人民奋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气概，又证明了清政府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教育了章炳麟，他的“客帝”幻想破灭了，而反清排满的意志则愈益坚定。

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在上海发起“中国议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该会宗旨宣布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同时又拥戴光绪皇帝，态度暧昧。章炳麟认为不应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因此“宣言脱社，割辫与绝”^①。后来又写了一篇《解辫发说》的文章，表示耻于“被戎狄之服”，决定“荐绅束发”，穿上西服。“断发易服”这一行动，标志着章炳麟正式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章炳麟一旦从改良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精神上便获得了很大的主动，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有如风发泉涌，不可遏止。他对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自己以往的改良主张感到悔恨与痛心，在刚刚出版的《煌书》木刻本《客帝》篇上，写下一条眉批，痛加自责，指出这篇作品“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影响极坏。不久，撰《客帝匡谬》一文，进一步严肃地批判了自己对清帝怀抱幻想的错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并且指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认识到清朝统治者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如果不推翻它，爱国就谈不上，反帝也不会成功，中国人民最终只能沦落为列强的二等奴隶。这将是何等可怕景象啊！

一九〇〇年八月，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失败，唐本人被捕杀。章炳麟亦被清政府列入黑名单，他为逃避追捕，悄悄回家乡度岁。正月初一那天，他听说跟踪追捕的人将至，急忙逃入一所佛寺里躲避，十天以后见没有什么动静，乃潜往上海。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虽然亡命海外，但仍然坚持改良主张，组织保皇党，鼓吹光绪皇帝复辟，反对革命。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陆续发表文章，散布保皇滥调，欺骗舆论，蛊惑人心。章炳麟看了非常气愤，立即撰写《正仇满论》^①，对梁启超的谬论逐条予以驳斥。梁启超说：有爱国心的人不应当仇视满人。章炳麟说：革命并非仇视之谓，清

① 发表于1901年8月10日出版的《国民报》第四期。

朝统治者反动腐朽，丧权辱国，“虽无入关以来屠剑焚掠、钳束聚敛之事，而革命固不得不行”。何况革命只是把满人逐出关外，并非一律诛杀，这也可说是“至公至仁”了。梁启超说：光绪皇帝是“圣明之主”，如其复辟，中国即可“转弱为强”。章炳麟说：这不过是幻想而已。光绪并非那种“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的圣明之主，他搞的百日维新，“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而且他没有尧那样的聪明文思，彼得大帝那样的雄桀独断，变法是闹不成的。章炳麟还指出，梁启超设计的君主立宪政体纯属空想，因为君主立宪必须有国会议院，而二者皆起于民权，然而中国现在毫无民权，所以梁启超的政治方案是行不通的。章炳麟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梁启超反对革命的险恶用心：“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正仇满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批驳改良派政治主张的第一发重炮，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论争的一篇历史文献，值得重视。当然，该文也流露出了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情绪，把满族看作与欧美一样的“异种”，宣称：“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甚至认为“日为同族，满非同族”，所以，“日亲满疏”。这些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

章炳麟因为已经剪掉了辫发，在上海出入很不方便。时值美洲传教士主办的苏州东吴大学招聘教员，吴君遂乃介绍他到该校任教。这期间他曾经去看望以前的